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张岱年 主编



使西纪程

郭嵩焘集

陆玉林 选注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鲁迅 呐喊

鲁迅 彷徨

鲁迅 热风

鲁迅 华盖集

鲁迅 华盖集续编

鲁迅 热风

鲁迅 华盖集

鲁迅 华盖集续编

鲁迅 华盖集

鲁迅 华盖集续编

鲁迅 华盖集

鲁迅 华盖集续编

(辽)新登字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使西纪程:郭嵩焘集/陆玉林选注.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6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张岱年主编)
ISBN 7-205-02864-7

I. 使…

II. 陆…

III. ①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②政论-中国-近代-选集
③郭嵩焘-文集

IV. D092.5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03,000 印张:5 $\frac{1}{2}$ 插页:5

印数:1—1,581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 杨

版式设计:赵耀今

封面设计:赵多良

责任校对:崔维诚

定 价:5.70 元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总序

在历史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这套“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件极有意义，极值得称道的事。

尽管这些著述原是撰写于 80 多年以前，它的作者也和那个时代一起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当人们重新翻阅这些古色斑斑的书页时，仍然无法轻松和平静。这是启蒙先驱者们的呐喊和沉思，它激昂、悲壮而又深沉无比，仿佛融进了多少代人的希冀与渴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启蒙者和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写下了最为辉煌又最为感人的一章。

它发生在中国大封建王朝彻底崩溃的前夜。这是一个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时代，亦是近代中国社会一个大转变的时代。那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已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后面，国内矛盾重重，国外列强环伺。自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始，帝国主义的坚舰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就被推向了备受屈辱和更加不幸的境地。但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舰利炮并没有把中国人吓倒，相反却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危

亡感，从而开始了一场持久而又悲壮的救亡运动。民族救亡、爱国强国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成了整个启蒙运动的主旋律。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近代社会大转变的时期也是“门户开放”、“西学东渐”的时期。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当时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一方面撷择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利于变革的观点，如《周易》的变易观念、《公羊传》的“三世”观念、《礼运》的大同思想等；一方面参照当时所了解的西方情况提出一些革新的方案。当时梁启超、章太炎通过日本译籍而了解西学，严复则直接介绍了西方近代的一些进步学说。严译的《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在当时风行一时。孙中山则直接接受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根据国情加以改造，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和伟大并不在于它是否取得了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和胜利，而是在于它曾给人们心灵上所带来的强烈而持久的震撼，并不在于它自身理论的如何完美，而是在于它曾给予，并继续给予人们的启示和思索。许多启蒙思想家们苦苦追问和求索的问题诸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制、教育与科技、东方与西方、爱国与强国、农业经济与工业生产、儒家伦理与现代文明等等，即使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启蒙者的思想连同那一次又一次的启蒙运动一起不仅属于历史，它同时更应该属于或必然属于今天和未来。虽然“洋务运动”过去了，“变法维

新”过去了，“辛亥革命”过去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完结，五四运动便是启蒙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一再提倡解放思想，更换脑筋，这又何尝不是启蒙精神在新时代的高扬？

今年是五四运动 75 周年，我们谨以这套丛书来纪念“五四”，也呼唤着新的启蒙精神的到来。

张岱年

1994 年 1 月于北京大学

编 序

当泰晤士、莱因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时，黄河、长江之畔已经产生了辉煌灿烂的文化。然而，鸦片战争的硝烟结束了中国人俯视一切的历史，天朝帝国尽善尽美的幻想被血淋淋的现实击得粉碎。在这离奇的悲剧性现实面前，一些先进的读书人敢于直面，历经千辛万苦，到西方去寻找富强之路。在这群人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就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任驻外公使，湖南湘阴人郭嵩焘（1818—1891）。

70年前，梁启超讲过这样的故事：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噫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①

这里所说的“一部游记”，就是《使西纪程》。这部两万多字的小书，是否“有二心于英国”，有识之士自能明鉴。而

① 《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原载《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

在当时激起迂腐之人的公愤，“贤明”的圣上有诏申斥、传令毁板却千真万确。因为这部《使西纪程》和其他言论，曾使官至兵部左侍郎的郭嵩焘，死后不但未能被按照常规而予以立传赐谥，而且数十年后还有人要戮其尸、践其骨，这是郭嵩焘的悲剧，也是他的荣耀。

一切还得从源头说起。

湖南，这块历史上的蛮荒之地曾经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伟人。从自投汨罗的屈原，到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无数雄才都是从这块土地上开始他们的征程。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南的位置更是十分奇特而重要。当洋人的枪炮从广东沿海打开中国的大门，湖南首当其冲。这块向以保守、霸蛮而闻名于大江南北的土地不得不接受新思想的洗礼，新旧思想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这场殊死的冲突，正是一大批湖南读书人登上政治舞台的契机。这群全国上下都为之侧目的读书人中，当时叱咤风云的有曾国藩、左宗棠，两人都是郭嵩焘的朋友。然而朋友总归只是朋友，除此以外什么都不是。曾国藩觉得郭嵩焘（号筠仙）“芬芳悱恻”，如同屈原一样不走“修、齐、治、平”的正道；左宗棠还曾参了一本，让郭嵩焘丢了代理广东巡抚这个官。但到底谁走的是正道，今日也没法下结论。总之，他们走得不是一条路。曾国藩带着他的湘军南征北战，左宗棠也要马革裹尸，都是希望以武力换取天下的太平，而郭嵩焘则是要从思想和制度方面来解决现实社会和个人思想的危机。所以曾、左得以因赫赫战功而名震遐迩，让当时的士大夫们

佩服得五体投地，而郭嵩焘则注定要在正统士大夫们的讥笑怒骂中渡过一生。幸而，郭嵩焘还有湖南人那种不甘被环境所征服的蛮气，还有积极进取的狂者精神，否则，黑暗的冬夜里的这颗思想的启明星等不到升起就会殒落。

郭嵩焘所选择的特殊的解决当时社会危机的路径，或许与他的家庭出身和生活历程有关。郭嵩焘1818年出生在湖南湘阴县城一个富甲一方的家族之中。郭家致富主要是靠经商和借贷，而不同于大多数“耕读传家”的地主。所以在郭嵩焘眼底，商贾和士大夫应该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而没有传统的轻商思想。

郭嵩焘生而颖异，个性极强。他外貌温恂，但才识出群，思想十分活跃，好胜心极强，自负而又傲慢。18岁时，郭嵩焘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与刘蓉、曾国藩换帖定交。刘、曾二人皆是雄才大略之人，都有建功立业的抱负。郭嵩焘虽与二人同窗共学，也有济世之心，但志向颇不同。郭嵩焘对当时的现实政治颇为不满，认为官贪吏暴，人民穷困，怨气日积，唯有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政治体制，国家方能有望复兴。而曾、刘虽然也知道当时的现实政治弊端丛生，但并不认为已到了非彻底变革不可的程度，而是希望在不变革当时的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尽自之力，以图中兴。所以曾国藩等积极从事现实的军事政治活动，而郭嵩焘虽然也出过一些主意，如建议曾开厘捐筹军饷，办水师以确保交通等等，但并不积极。他虽然自称“年22，即办洋务”，但也并非亲自去操作，只是“相与愤然言战守事宜”而已。

这是在1840—1842年的中英战争期间，郭嵩焘在浙江学政罗文俊幕中参与海防事务时候的事。然而，“洋患”毕竟是当时最迫切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不但国家不可能富强，甚至连自主自立都谈不上。所以“洋患”问题该如何解决，遂成为郭嵩焘一生思考的核心。有人说郭嵩焘是“洋务派”中人，就此而论，确实不差。但将郭嵩焘划归“洋务派”也十分牵强，因为他的思想和“洋务派”的主导思想相差不知几万里许。

“洋务派”倡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认为西方的强盛主要是因为“技”，就是“船坚炮利”。他们以为造几艘铁甲船，购置几支洋枪洋炮，便可以巩固海防，杜绝洋人之覬覦，国家遂可以得自主而致富强。对这种想法和做法，郭嵩焘十分不以为然，指出这些人既不知西洋强盛之本，也不知办理洋务之本。光绪元年（1875年），在家赋闲8年的郭嵩焘因文祥的推荐而得任福建按察使。在按察使任上，他上了著名的《条议海防事宜》（下简称《条议》），此《条议》一出，郭嵩焘和“洋务派”的分歧便公开化了。

郭嵩焘认为，海防之事，包括练兵、制器、造船、用人、理财、持久等，总的原则要因地、因时、因人，而其根本则在“正朝廷以正百官”，就是要从政治体制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于和洋人交涉，也就是师夷之长以制夷，“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这就是说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政治、经济体制，而办理洋务、杜绝洋患也

应从这一根本入手，单是从用兵制器着眼，是举其末而忘其本。“洋务派”之所为，不过是舍本逐末，其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郭嵩焘的这一论断，历史业已证明它是非常正确的。据此，我们可以说，郭嵩焘虽然以办理“洋务”而闻名，但确实不能算一个“洋务派”的人。他比“洋务派”那些人站得高，看得远。

在具体措施上，《条议》主张扶植“商贾”（即中国资产阶级），让他们去效法洋人，发展工商业。郭氏的理由是：商人“有计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之计，因而有考览洋人所以为得失之资。”这就是说，只有商人、企业家们才有可能抛弃一切无聊的争辩，而脚踏实地去学习外国资本家的长处，才能把这些长处学到手，这于国于民都有利。其实，“商贾”们才能真正赋予劳动和赚取利润以价值和尊严，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在贬抑商人，而把一切商品生产和经营的权力都垄断在国家、政府的手中。郭嵩焘既对传统的“轻商”思想提出激烈的反对，也反对国家垄断新式工业的做法。他指出：官办企业根本不可能办好（现在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困境也证明郭氏是对的），而“官督商办”（即现在所谓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企业管理和经营的方式）也行不通。原因在于职责不明，而商人（即企业家们）也因为没有自主的决策权力也不拥有资产而没有任何积极性，因此，郭嵩焘说：“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多怀疑不敢应，固不如使商人自制之情得而理顺也。”

(《条议》)这就是说,国家应该把属于谁的东西交给谁,把该由谁做的事交给谁做;政府不应该也没有能插手具体的经济事务,它的任务只是制定适宜经济发展的政策而已。这是郭氏将西洋的情形和中国比较后所得出的结论,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结论。

郭嵩焘不厌反复、再三强调的是:“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如果没有好的朝廷政教(即政治制度),那么再好的商贾也不可能尽展其长。而朝廷政教正是导致中国积贫积弱之源,所谓“必纪纲法度先驰于上,然后贤人隐伏,民俗日偷,而边患乘之”,因此改革图强之本也正在朝廷政教。这实是主张变法之先声,在当时可以说是震聋发聩。不过,此时郭嵩焘对朝廷政教到底该怎样变革还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直到出使西洋之后,郭氏才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然而,就是这种抽象的、思想观念层次上的新颖独到的见解已令习惯于旧有的体制而沉溺于鸦片烟和挟妓遨游的官僚士大夫们切齿痛恨。因此,《条议》一出,郭嵩焘在京师几无容身之地。

这年春天,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A·R·Margary)在云南被杀,迫于英方压力朝廷不得不考虑派大员赴英“通好谢罪”,遂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郭嵩焘接受使命后,上疏主张将云南巡抚岑毓英议处。本来出使之事已被视为“事鬼”,而《请将滇抚岑毓英交部议处疏》更被一般既蠢且怕又不明事理的士大夫们视为辱国。在一片咒骂声中,郭嵩焘为进一步“通察洋情”、探究西学和

西洋政教的真理，以望六之年、多病之躯毅然命道。遂有《使西纪程》。

《使西纪程》是郭嵩焘从上海到伦敦五十天的日记经由他自己整理后而成。在《使西纪程》中，郭嵩焘据其所见所闻，而申言西洋也有两千年的文明；指出西洋富国强盛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而因人民与国家同其利病，故国运长久。这些言论，如前所述，是一般士大夫们所不能接受的。同时，因为这些言论有其现实的依据，所以也彻底打破了所谓天朝帝国尽善尽美的欺人之谈，更让愚昧的士大夫们切齿，遂断定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其实，郭嵩焘只不过是说了一些真话，只不过是希望中国能以西洋为鉴而改变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局面。然而，郭嵩焘的真话却确实多触忌讳。

其一，郭嵩焘认为并不是中国政教优于西洋，而是西洋政教优于中国。他在英国考察后曾说英国“‘巴力门’（按：Parliament，国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按：Mayor，民选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请”，而中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却适得其反，因此西洋称中国为“哈甫色维来意斯得”（按：half-Civilized，半开化的），而西洋人视中国，正如中国三代盛时视夷狄。认为中国的政教（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等）优于西洋（夷狄）正是当时中国大部分人的精神支柱，而郭嵩焘却如是说，怎能不让人怀疑他“有二心于英国”，而居心叵测呢？

其二，郭嵩焘说只有民主之国才能强盛。郭氏在听禧

在明（W·Hillier）谈到英人在澳洲、印度开发的情形后，即谓人民应与国家同其利病。在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之后，说的就更明白：“非民主之国，则势有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主兼主国政故也。”国人所谓明君贤相，其实是靠不住的，国家要强盛，第一要务是依西洋之政体而加以改革。郭嵩焘说这番话的时候，孙中山还没有见到西洋的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而康有为也是在此之后两年才意识到西洋治国原来还是有法度的，所以郭氏没有被杀头已算很不错了。

其三，郭嵩焘说要拒夷狄于国门之外，让天朝和夷狄完全隔绝是靠不住也不可能的，因此不但要敞开大门，而且要学习其立国之本，强兵富国之术，尚学求艺之方。当时的顽固派们根本不把西洋人当人看，说外国人根本不是人而是有一点人气的物而已。但郭嵩焘却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不但西洋人不是夷狄，而且西洋技术发达，“七万里一瞬而至”，所以想隔也隔不住，想把国门锁上也无从锁起。

其四，西洋人才辈出，实赖其教育。郭嵩焘一到香港，便“周历学堂数处”，而到英国之后更是热心参观学校、博物馆、图书馆，这位在中国早有“学问文章，世之凤麟”的翰林却慨叹自己年老失学、不通外文，而希望中国能改变教育制度，多培养一些“不为虚文”的人才。但中国虽将“师”看成是仅在天、地、君、亲之下的人物，却既不重

“师”，而教育更是专以“时文（按：八股文）小楷”为务。这样一来，不但赶不上西洋，连东洋倭人都不如。

其五，郭嵩焘说西洋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虽然不足为师道，但较之中国还要好一些。孔老夫子在中国一直被当成圣人，而儒家的伦理观念是天之经、地之义，郭氏却说还不如西洋。这种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批判，就是在今天恐怕也让很多人难以容忍，或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郭嵩焘出使英伦，本来就没有人理解和支持，而又敢倡种种异论，《使西纪程》自然难逃毁板之厄。《使西纪程》毁板之后，与郭氏一同出使的刘锡鸿立即上疏，历数郭氏“三大罪”，所谓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堂堂天朝大使竟向区区巴西国国主致敬、柏金宫殿听音乐仿效洋人取阅乐单。“贤明”的天朝君主和士大夫们竟然真的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饶恕之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要将他查办治罪。郭嵩焘上疏辩解不果，只得奏请销差，时为1878年5月6日，距他到伦敦仅一年零七个月。1879年1月31日，郭嵩焘离伦敦回国。

回国之后，郭嵩焘即称病乞休，返归故里。抵长沙时，据其当天日记，长善两县竟不许他入境，而士绅们张贴布告，说他勾通洋人。然而，就是在这充满敌意的氛围中，这位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坚持立国之本在朝廷政教的孤独的思想启蒙者仍然要批评国事，谈论洋务，他坚信：“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

也。”^① 然而，他的话在当时是没有人想听，也没有人愿意听的，他只能寄希望于将来。在“白头萧索倚闲阶”的凄凉晚景中，他吟道：“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②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或许人们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不让他九泉之下还慨叹“生年不及汉明章”了吧。

陆玉林

1993年11月

① 见《铁路议》。

② 《戏书小像》。

凡 例

1. 《使西纪程》中的衍文、缺、脱文和作者自注，分别以“〈 〉”、“〔 〕”和“（ ）”标出。原文讹误和编者的说明也用“（ ）”标明正字或稍加解释，如：

雨，风〈雨〉……（11月初4日）

陶养人才遗意。〔中国师儒……〕……（10月21日）

行八十英里（每一英里……）……（10月初4日）

山势绵互（亘）相属。（10月20日）

2. 《使西纪程》略加注释，一律用脚注，所注大部分为郭氏用汉字对音写出的外国词语，如：

②麦华陀：Water · H · Medhurst 当时英国驻上海领事。

3. 日记基本上不注，作者旁注用六号宋体字移入正文。

4. 所选郭氏言论基本上采自清代王先谦等编定刊行的《养知书屋遗集》的奏疏、文集部分，大都用脚注略加说明。

目 录

总 序	张岱年	1
编 序		1
凡 例		1
一、使西纪程		1
附录：上海至伦敦日记		45
附录：《泰晤士报》论郭嵩焘离任		82
二、言论选辑		87
1. 条议海防事宜		87
2. 因法事条陈时政疏		97
3. 论河务疏		106
4. 办理洋务宜以理势情三者持平处理折		110
附录：拟销假论洋务疏		116
5. 喀什噶尔剿抚事宜请飭左宗棠斟酌核办片		123
6. 续陈禁止鸦片事宜折		125
7. 请纂成通商则例折		130
8. 新嘉坡设立领事片		133
9. 伦敦致李伯相		135
10. 致沈幼丹制军		144